

沙特研究

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 现状、风险及应对^{*}

包澄章

摘 要: 沙特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近年来,沙特内政与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使其面临的潜在风险上升,主要包括:国内权力结构变动和政治集权化趋势使沙特政局走向存在不确定性;经济结构性矛盾和制度不畅制约国内经济转型与改革;本土恐怖主义和胡塞武装越境袭击加重国内安全压力;宗教保守势力反弹和宗教极端主义泛滥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在此背景下,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进一步确保中沙合作的政策延续性和平衡中国与沙特及伊朗的关系,适应沙特国内经济转型阵痛并最大程度地实现中沙发展战略对接,同时防范恐怖主义和胡塞武装越境袭击对在沙中国公民和企业的威胁。

关键词: 沙特;“一带一路”;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安全风险

作者简介: 包澄章,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8)04-0074-16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ZJ010)和上海市I类高峰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建设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英才海外研修计划”和2015年度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科研项目“当代中国中东外交战略研究”的资助。

沙特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国家^①和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中唯一的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②,也是中国发展与伊斯兰国家战略关系的重要支点国家。近年来,沙特内政与外交政策经历重大调整,评估和研判新形势下沙特国内面临的潜在风险,对中国在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现状

2008年6月,中国和沙特建立了战略性友好关系。2012年1月,中沙两国决定在战略框架内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水平。2016年1月,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③在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沙特加快国家转型的背景下,中沙经济结构的互补、对外经济战略的契合、政治互信的增强、合作机制的健全,为两国深化各领域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 合作机制建设

当前,中国和沙特依托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多边合作机制、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机制、中国文化部下设的“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机制以及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框架下的双边合作机制等开展各领域合作。

第一,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一系列合作机制^④为中国同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加强对话与开展集体合作确立了方向。自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迄今已举办了7届部长级会议^⑤、14次高官会和3次高官级战略政治对话会^⑥,深化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2016年1月,中国政

① 沙特官方在“2030愿景”中将“沙特作为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核心国家的重要地位”作为该愿景的首要支柱。参见“Vision 2030: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Saudi Vision 2030*, p. 6, http://vision2030.gov.sa/sites/default/files/report/Saudi_Vision2030_EN_2017.pdf, 登录时间:2018年3月1日。

② 郝亚琳:《习近平会见沙特王储继承人穆罕默德》,新华网,2016年8月3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8/31/c_1119488925.htm, 登录时间:2017年10月7日。

③ 相关声明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关于加强合作与战略性友好关系的联合声明》(2008年6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联合声明》(2012年1月16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6年1月19日)。

④ 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合作机制包括:部长级会议、高官委员会会议、中阿企业家大会暨投资研讨会、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阿友好大会、中阿能源合作大会、中阿新闻合作论坛、中阿互办艺术节、中阿卫生高官会议、中阿北斗合作论坛等。

⑤ 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将于2018年7月10日在中国北京召开。

⑥ 2015年6月,中国外交部与东盟秘书处建立了高官级战略政治对话机制。参见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研究中心:《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集体合作站上新起点:“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成就与展望》,(2018年5月)中阿合作论坛网站,第8页,<http://www.cascf.org/chn/lttd/P020180614580301500634.pdf>, 登录时间:2018年6月17日。

府发布《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①, 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整体发展进行了全面规划和系统设计, 也为未来中国与沙特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二, 中国文化部下设的文化交流合作机制推动中国和沙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人文交流与合作。2016 年 12 月, 中国文化部发布《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 年)》, 从合作机制、合作平台、品牌效应、文化产业及对外文化贸易等领域, 全面规划了中国与外部世界构建“文化交融的命运共同体”的目标^②, 对加强中国与沙特的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 推动两国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贸易创新发展健全了机制与平台。

第三, 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机制为中国同沙特等海合会成员国之间增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合作、密切人文交流确立了合作机制, 为加快中海自由贸易区谈判奠定了战略基础。^③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中国对海湾国家的政策经历了从以“伊朗为中心”(1990~2001 年)向“以沙特和伊朗为中心”(2001 年至今)^④的转向, 作为海湾地区大国的沙特在中国中东外交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10 年 6 月、2011 年 5 月和 2014 年 1 月, 中国同海合会成员国先后举行了三轮战略对话。

第四, 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为加强“一带一路”与沙特“2030 愿景”对接、统筹和促进双方各领域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2016 年 8 月, 两国成立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以下简称“中沙高委会”)。中沙高委会下设六个分委会, 即政治外交分委会, “一带一路”重大投资合作项目和能源分委会, 贸易和投资分委会, 文化、科技和旅游分委会, 安全合作分委会和军事合作分委会, 覆盖政治、外交、经贸、能源、文化、安全、军事等多个领域。自中沙高委会成立以来, 两国已联合召开了多次高委会和分委会会议。

海合会国家是引领阿拉伯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 近年来海合会国家加速工业化进程和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的需求日益提升。中国提出中阿构建以能源合作为主轴, 以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两翼, 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的“1+2+3”合作格局, 推动建立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机制和成立中沙高委会, 体现了中国依循区域合作、次区域合作、双边合作的多层次路径, 通过深化与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的合作关系, 带动中阿关系整体发展的政策考量。这

① 参见《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 新华网, 2016 年 1 月 13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1/13/c_1117766388.htm, 登录时间: 2018 年 3 月 7 日。

② 参见《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 年 12 月 28 日), 文外发[2016]40 号, 中国文化部网站, http://zwgk.mcprc.gov.cn/auto255/201701/t20170113_477591.html, 登录时间: 2017 年 10 月 19 日。

③ 参见郝亚琳:《习近平会见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代表团》, 新华网, 2014 年 1 月 17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1/17/c_119021511.htm, 登录时间: 2017 年 10 月 18 日。

④ 吴冰冰:《从中国与海湾八国关系的发展看“中阿合作论坛”》, 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 年第 1 期, 第 13-14 页。

种多层次合作结构有利于促进中沙多边合作与双边合作的互动。区域合作机制旨在加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多边合作以及对中东地区事务的集体磋商,次区域合作机制有利于深化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战略性合作和推动海湾地区经济一体化,双边合作机制有利于直接促进中沙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和“打造全方位立体合作的新格局”^①。

(二) 合作特点

自 2000 年至 2015 年,沙特连续 16 年成为中国最大原油供应国^②,连续多年成为中国在西亚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③。2012 年中沙双边贸易额曾达到创纪录的 734 亿美元^④。2013 年中国首次成为沙特第一大贸易伙伴。2016 年 9 月 26 日,中国开通人民币对沙特货币里亚尔的直接交易,为两国货币流通打下了坚实基础。2016 年,中国对沙特直接投资额达 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中资企业在沙特当地注册的合资、合作、独资企业及分支机构超过 160 家。^⑤ 2017 年中沙双边贸易额达 5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3%,其中,中国从沙特进口额达 318 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 34.4%;中国向沙特出口额达 182 亿美元,较上一年下降 2.3%。^⑥ 2017 年中国对沙投资 8,879 万美元,沙特对华投资 1.5 亿美元;中国对沙特新签承包工程合同 124 份,新签合同额 29.28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63.44 亿美元。^⑦ 至 2017 年,140 多家大型中资企业在沙特承揽合作项目,涵盖能源、矿产、港口、路桥、通信等领域。^⑧ 当前,中国和沙特的合作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中沙高层互动频繁。2016 年 1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沙特,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新形势下两国已将对方置于本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重要方向;同年 8 月底,时任沙特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访华,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共同主持中沙高委会首次会议,并出席 9 月初召开的 G20 杭州峰会。2017 年 3 月,沙特国王萨勒曼访华,并同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谈。同年 8 月,张高丽访

① 侯丽军:《张高丽和沙特王储继承人兼第二副首相、国防大臣穆罕默德主持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

② 《王毅外长接受沙特〈中东报〉书面采访稿》,中国外交部,2017 年 3 月 15 日,<http://www.fmprc.gov.cn/web/wjbzhd/t1445880.shtml>, 登录时间:2017 年 9 月 20 日。

③ 周轶、宦翔:《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前景广阔—访沙特驻华大使图尔基·阿尔马迪》,载《人民日报》2017 年 3 月 16 日,第 21 版。

④ 《沙特阿拉伯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商务历史,<http://history.mofcom.gov.cn/?bandr=stalbyzgdjmhz>, 登录时间:2018 年 3 月 20 日。

⑤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沙特阿拉伯(2017 年版)》,<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gbdqzn/upload/shatealabo.pdf>, 登录时间:2018 年 4 月 10 日。

⑥ 《中国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60/sbgx_676864/, 登录时间:2018 年 5 月 7 日。

⑦ 文月:《2017 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发展述评》,载《国际工程与劳务》2018 年第 3 期,第 42 页。

⑧ 王波:《财经观察:沙特经济多元化举措初见成效》,新华网,2018 年 3 月 15 日,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3/15/c_1122543958.htm, 登录时间:2018 年 3 月 19 日。

问沙特吉达,并与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沙特共同主持了中沙高委会第二次会议。中沙高层之间的频繁互动,为两国加强战略合作、增加政治互信、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奠定了基础。

第二,能源贸易引领中沙经贸。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国从沙特进口的主要商品为原油和石化产品,中国向沙特出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日用品等,两国经济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格局深入调整,调整趋势表现为能源结构多元化、能源供需多元化和能源定价多元化。^① 受此影响,中国从沙特进口的原油量在中国原油进口量中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自 2016 年以来,俄罗斯取代沙特连续两年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2017 年,中国从沙特进口原油 5,218.12 万吨,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 12.44%^②,较 2016 年的 13.4% 下降 0.96%^③。国际能源格局的变动和新兴大国的崛起,使得沙特稳固与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在能源领域相互依赖关系的需求进一步凸显。萨勒曼国王上台后延续了自阿卜杜拉国王时期以来沙特外交“向东看”^④的政策路线,积极发展与中国等亚洲新兴大国的合作关系。与此同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能源进程的加快,使得中沙能源合作正从传统的石油领域向可再生能源领域拓展。

第三,中沙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持续推进。沙特的国际建筑工程承包市场庞大,国内绝大多数大型建筑工程项目均由外国企业承包。而中国企业在海外工程承包领域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在成本控制、按时交付、工程质量、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突出能力受到普遍认可,在高铁等领域拥有自主创新专利技术。2015 年,沙特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至 2017 年,中沙双方已确定第一批产能与投资合作 30 个重点项目,总金额约 550 亿美元,其中的 8 个项目已开工建设,22 个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⑤ 近年来,两国正在探索引入第三国参与基建项目的“三方合作”模式。例如,2016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期间,丝路基金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签署了关于共同开发阿联酋及埃及电站的谅解备忘录。

第四,中沙合作领域深入拓展。自中沙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两国合作超越了经贸、能源等传统领域,正在向航天、科技

① 韩立群:《国际能源格局转型重塑进入关键期》,载《瞭望》2017 年第 19 期,第 64 页。

② Ibrahim Al-Othaimin, “Win-win Cooperation Usher in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Ties,” *Saudi Gazette*, May 5, 2018, <http://saudigazette.com.sa/article/534190/SAUDI-ARABIA/Win-win-cooperation-usher-in-new-type-of-international-ties>, 登录时间:2018 年 5 月 15 日。

③ 《沙特阿拉伯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④ Makio Yamada, “Saudi Arabia’s Look-East Diplomacy: Ten Years On,”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2, No. 4, 2015, p. 121.

⑤ 《中沙产能与投资合作论坛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网站,2017 年 8 月 24 日,http://www.ndrc.gov.cn/gzdt/201708/t20170824_858708.html, 登录时间:2017 年 11 月 4 日。

等领域拓展。2017年3月沙特国王萨勒曼访华期间,两国签订了《沙特参与中国“嫦娥四号”的合作备忘录》《无人机制造合作协议》《和平利用核能事务的谅解备忘录》《高温气冷堆项目联合可行性研究合作协议》《铀钍矿资源合作谅解备忘录》等一系列文件,标志着中沙合作正从传统的经贸、石油领域向航天、科技、核能等领域拓展。在人文交流领域,2016年12月沙特首次在中国举办“阿拉伯之路——沙特出土文物展”,2017年2月中沙两国首次联合制作的动画片《孔小西与哈基姆》在沙特首映,同年3月沙特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公共图书馆北京大学分馆正式开馆,都体现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沙人文交流深度和广度的进一步拓展。

二、当前沙特国内主要风险评估

近年来,沙特内政外交出现重大转向,引发了国内和地区局势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当前,沙特国内风险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四大领域,这些风险或对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产生影响。

(一) 政治风险

经过两轮废黜与重立王储的政治运作,萨勒曼国王完成了指定未来接班人的目标。继承制度的更改打破了沙特王室内部既有的权力结构,而萨勒曼父子一系列集权措施进一步增加了沙特国内的政治风险。

第一,权力结构变动引发王室内部争端。2015年1月沙特国王萨勒曼登基后,一改“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先后两次废黜王储,最终立其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王储,完成了王位继承从第二代亲王向第三代亲王的过渡。为扫除潜在的政治竞争对手,穆罕默德王储于2017年11月发动自上而下的反腐运动,更换国民卫队、王室办公厅、情报总局、内政部、经济和计划部、石油部等关键部门负责人,将军事、政治和经济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这一强化集权的过程在打压政治对手和异己势力的同时,也改变了长期以来沙特王室内部各派系通过执掌不同部门形成的权力平衡结构。自萨勒曼国王上台以来,沙特王室已经挫败了数起政变企图^①,穆罕默德王储在日渐全方位掌控国家权力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因大规模整肃运动导致王室成员不满的现实,沙特王室内部权力结构剧烈变动引发的潜在风险或将成为未来萨勒曼父子统治的重要挑战。

第二,王储的个人因素为沙特国内决策注入不确定性。穆罕默德王储的年轻形象及其领导的大规模经济和社会改革计划迎合了占沙特人口70%的30岁以下青年

^① Dipanjan Roy Chaudhury, “How Saudi Princes’ Arrest Averts Coup in Oil-rich Kingdom,” *The Economic Times*, November 13, 2017,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international/world-news/how-saudi-princes-arrest-averts-coup-in-oil-rich-kingdom/articleshow/61620734.cms>, 登录时间:2017年12月8日。

对国家进行现代化改革的期望。但穆罕默德的强悍个性和草率行事风格,亦增加了沙特国内决策的风险。2015年3月,在外汇储备萎缩、军队作战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时任沙特国防大臣的穆罕默德作出出兵也门的决定。2017年6月和11月,沙特与卡塔尔断交、鼓动黎巴嫩总理哈里里辞职等外交决策,导致沙特与伊朗在地区代理人竞争的战线不断拉长。沙特政府计划斥资5,000亿美元打造“尼尤姆”高科技新城,面临执行和融资方面的难题,配套法律和投资环境的不完善也可能使国际投资者“望而却步”。与此同时,沙特国内劳动力结构失衡、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外汇储备不足等社会经济问题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穆罕默德王储关于“‘尼尤姆’新城的职责并不是为沙特人创造就业”^①的言论更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批评。

第三,沙特和伊朗的地区代理人竞争加剧。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巴林危机、叙利亚内战、也门乱局、沙特和伊朗断交、卡塔尔断交危机、黎巴嫩哈里里辞职风波等地区热点问题,都反映了沙特和伊朗围绕地区领导权的斗争持续升级的现实。在沙特看来,伊朗领导的什叶派阵营不断在巴林、也门、黎巴嫩、伊拉克等沙特邻国及沙特东部省什叶派聚居区“煽风点火”,使得近年来沙特周边和国内什叶派聚居区的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特朗普上台后,重新巩固同盟友沙特的关系,奉行遏制伊朗的敌对政策。在此背景下,沙特为扭转颓势,以进攻性外交与伊朗开展多线代理人斗争的趋势凸显,进一步加剧了沙伊关系恶化的态势。

(二) 经济风险

2016年4月,沙特政府推出“2030愿景”,着力推行经济改革、打造多元经济、提升社会活力、促进对外开放和吸引国际投资。两年多来,沙特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包括首次向外国投资者开放股市,放宽外国公司对工程服务、批发和零售行业的所有权限制,对香烟、饮料开征特殊商品税等。^②目前,沙特计划将全球第一大石油生产商——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简称“沙特阿美”, Saudi Aramco)上市,并出售5%的股份。然而,经济结构性矛盾、转型动力不足、制度障碍和地缘局势紧张使得沙特经济前景并不乐观。

第一,沙特短期内难以扭转经济颓势。首先,沙特经济持续低迷。自2014年6月以来,国际油价呈现下行走势,导致沙特石油收入锐减,经济增长持续放缓,2015年3月沙特介入也门战事更是使其深陷巨额财政赤字。在石油减产政策和经济改革措施的作用下,2017年上半年沙特财政赤字从2016年的790亿美元缩减至193.8亿

^① Glen Carey, Vivian Nereim and Christopher Cannon, “Sun, Sea and Robots: Saudi Arabia’s Sci-Fi City in the Desert,” *Bloomberg*, October 26, 2017, <https://www.bloomberg.com/graphics/2017-neom-saudi-mega-city/>, 登录时间:2017年10月29日。

^② 王自励:《内外隐忧倒逼沙特“戒石油瘾”转型 中国企业机遇何在》,财新网,2017年8月17日, <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7-08-17/101131785.html>, 登录时间:2017年11月6日。

美元,但同期流入的外国资本不升反降。沙特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第一季度沙特GDP同比下降0.5%,自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全年GDP增速呈负增长(见表1)。其次,经济弊病制约沙特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沙特推行大规模、激进式的经济改革,但经济结构单一、巨额财政补贴、青年群体高失业率等长期困扰沙特政府的经济沉痾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制约了沙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萨勒曼国王上台后,沙特政府多次缩减或取消政府补贴、提高税费、叫停“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等一批大型基础建设项目,这使得沙特民众的实际收入大幅缩水。与此同时,沙特国内15至24岁青年失业率长期处于30%的高位(见表1),而沙特政府增加就业的政策效果不彰。一方面,沙特公共部门处于职位饱和状态。美林银行报告称,如果沙特政府不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至2030年沙特青年失业率可能攀升至42%;^①另一方面,沙特私营部门工作环境欠佳、工资普遍较低、雇主随意裁员,使得沙特青年不愿去私营部门就业,2016年沙特私营部门就业率较上一年下降了37%^②。再次,经济改革成效短期内难以显现。尽管“沙特2030愿景”提出了经济多元化的政策设想,但沙特单一的经济结构、能源行业收入缩水使得经济颓势短期内难以在根本上得到扭转,经济改革政策效果不彰。最后,国际社会对沙特经济预期和信用评级持续走低。2017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17年沙特GDP增长率预期从0.4%下调至0.1%,将沙特非石油行业的增长预期从2.1%下调至1.7%,2016年相关行业的实际增长率只有0.2%。^③2016年4月,全球知名评级机构惠誉将沙特主权信用评级从AA降至AA-,成为惠誉自2004年以来首次下调沙特评级;2017年3月,惠誉再次下调沙特评级至A+。

表1 沙特主要经济指标

主要经济指标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人口(万)	3,102	3,174	3,238
GDP(亿美元)	6,518	6,464	7,074
人均GDP(美元)	21,095	20,318	21,120
GDP年增长率(%)	4.11	1.67	-0.74

^① “Saudi Youth Unemployment Forecast to Exceed 42% by 2030,” *Arabian Business*, November 26, 2016, <http://www.arabianbusiness.com/saudi-youth-unemployment-forecast-exceed-42-by-2030-653770.html>, 登录时间:2018年2月4日。

^② Ali al-Shreami, “Work Environment in the Private Sector,” *Saudi Gazette*, January 17, 2018, <http://saudigazette.com.sa/article/526328/Opinion/Local-Viewpoint/Work-environment-in-the-private-sector>, 登录时间:2018年4月8日。

^③ 宋博奇:《沙特GDP八年来首现负增长》,中国经济网,2017年7月2日, http://intl.ce.cn/specials/zxgjzh/201707/02/t20170702_23975100.shtml, 登录时间:2017年11月6日。

(续表)

主要经济指标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年通胀率(%)	2.2	3.5	3
失业率(%)	5.6	5.7	5.5
15~24 岁青年失业率(%)	29.1	30.8	32.6
出口额(亿美元)	2,035	1,835	2,133
出口增长率(%)	-40.6	-9.8	16.2
进口额(亿美元)	1,746	1,401	1,368
进口增长率(%)	0.5	-19.8	-2.4

资料来源：“Saudi Arabia,” *IMF*, <http://www.imf.org/en/Countries/SAU#countrydata>; “World Bank Open Data,”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 “Population,” General Authority for Statistics, “Saudi Arabia,” *Statista*, <https://www.stats.gov.sa/en/854-0>; <https://www.statista.com/markets/422/topic/1033/saudi-arabia/>, 登录时间:2018 年 5 月 20 日。

第二,沙特经济转型和营商环境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2017~2018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指出,沙特从事商业活动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限制性劳动法规、融资渠道有限、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足和职业道德欠佳、政策不稳定、税率问题、政府官僚机构效率低下、税务法规不完善、创新能力不足、外汇法规不健全、腐败等。^① 首先,官僚特权阶层固化导致沙特政府效率低下。尽管近年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已着手对政府部门进行改革,但由于国内缺乏现代化管理人才,经济改革计划的执行面临困难和不确定性,特别是沙特建立在亲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传统经济模式短期内无法改变,官僚特权阶层固化的局面难以得到根本性扭转。其次,沙特经济缺乏透明度。国内腐败问题严重^②、制度保障匮乏和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传统等因素导致沙特政府决策透明度位列全球第 48 位,政府透明度在海合会成员国中位列倒数第二。^③ 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2017 年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7),沙特

① Klaus Schwab,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7-2018*, World Economic Forum, p. 252, <http://www3.weforum.org/docs/GCR2017-2018/05FullReport/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7%E2%80%932018.pdf>, 登录时间:2017 年 11 月 9 日。

② 2017 年 11 月,沙特国王萨勒曼发布国王令,成立最高反腐委员会,随即发起大规模反腐行动,以涉嫌腐败和洗钱等犯罪行为为由,逮捕了包括沙特首富瓦利德·本·塔拉勒在内的 11 名王子、4 名现任大臣和 38 名前政府官员,抓捕人数共计 200 余人。沙特总检察长在反腐行动声明中称,过去几十年间,因系统性腐败被滥用的国有资金高达 1,000 亿美元。参见韩晓明:《沙特反复七天抓了二百余人》,载《环球时报》2017 年 11 月 11 日,第 8 版。沙特官员称,沙特每年 8%~10%的预算因腐败而被贪污,参见 Robert Satloff *et al.*, “The Middle East through Gulf Eyes: Trip Report from Riyadh, Muscat, and Abu Dhabi,”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December 18, 2017,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the-middle-east-through-gulf-eyes-trip-report-from-riyadh-muscat-and-abu-dh>, 登录时间:2018 年 2 月 2 日。

③ 海合会成员国的政府透明度国际排名依次为:阿联酋(10)、卡塔尔(15)、巴林(26)、阿曼(37)、沙特(48)、科威特(104)。参见 Klaus Schwab,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7-2018*, pp. 252-253。

政府清廉指数在全球 180 个国家中排名第 57 位。^①最后,法律制度不完善。沙特国内实行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法源的伊斯兰教法,不设宪法。在伊斯兰教法原则的具体适用上,沙特法院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驻沙外国企业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商业纠纷,面临诉讼程序繁、周期长、执行难等困难,诉讼程序的拖延会使胜诉的一方“虽胜尤败”。^②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外国投资者在沙特境内开展投资时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保护,极大地降低了营商便利度。根据《2018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 2018),沙特的营商环境便利度在全球 190 个国家中仅位列第 92 位,在海合会六国中位居倒数第二。^③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鼓励企业家赴沙投资和增强沙特国际竞争力,沙特于 2016 年颁布了新《公司法》,赋予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在职责界定和公司发展战略决策等方面更大的权力,^④但沙特企业董事会效率在全球仅位列第 62 位^⑤。

第三,沙特军费开支持续高涨加重经济压力。近年来伊朗的地区扩张增加了沙特对周边安全的担忧,导致沙特军费猛增。首先,伊朗的崛起加剧沙伊地区竞争。制裁解禁后的伊朗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吸引投资、开展经济合作、增加石油产量,引发了海湾产油国尤其是沙特的担忧。沙特和伊朗围绕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不断升级,两国关系持续恶化。其次,沙特深陷地区冲突难以脱身。自 2015 年 3 月沙特领导多国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以来,沙特军费开支持续上升。2018 年沙特国防预算高达 2,100 亿沙特里亚尔(约合 560 亿美元),较 2017 年增长了 10.03%(见表 2);2017 年沙特的实际军费开支高达 2,240 亿里亚尔(约合 597 亿美元),比预算超支 17.4%。^⑥沙特因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四面出击”而支出的巨额军费开支,不仅增加了沙特经济的压力,而且为伊朗在地区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空间。最后,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调整进步恶化了地区安全环境。特朗普上台后,将遏制伊朗、巩固与盟友关系作为美国中东政策的总基调,加剧了沙伊之间的矛盾。受上述因素的影

①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7*,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February 21, 2018, <https://www.transparency.cz/wp-content/uploads/Corruption-Perceptions-Index-2017.pdf>, 登录时间:2018 年 3 月 1 日。

②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沙特阿拉伯(2017 年版)》,商务部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第 56-57 页, <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gbdqzn/upload/shatealabo.pdf>, 登录时间:2018 年 2 月 3 日。

③ 海合会成员国营商环境国际排名依次为:阿联酋(21)、巴林(66)、阿曼(69)、卡塔尔(83)、沙特(92)和科威特(96)。参见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2018: Reforming to Create Jobs*, October 31, 2017, p. 4, <http://www.doingbusiness.org/~media/WBG/DoingBusiness/Documents/Annual-Reports/English/DB2018-Full-Report.pdf>, 登录时间:2017 年 11 月 8 日。

④ 《沙特政府颁布新〈公司法〉》,中国驻吉达总领馆经商室网站, <http://jedd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605/20160501316817.shtml>, 登录时间:2017 年 11 月 8 日。

⑤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2018: Reforming to Create Jobs*, p. 4.

⑥ Craig Caffrey, “Saudi Arabia Increases Defence Budget,” *Jane’s 360*, December 21, 2017, <http://www.janes.com/article/76607/saudi-arabia-increases-defence-budget>, 登录时间:2018 年 1 月 8 日。

响,地区冲突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使得近年来沙特军费预算持续高企,进一步加重了沙特经济的压力。

表 2 2010~2018 年沙特国防预算(单位:亿美元)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国防预算	271.47	291.19	351.69	425.58	484.57	491.16	477.60	508.95	560.00
年增长率	9.64%	7.26%	20.78%	21.01%	13.86%	1.36%	-2.76%	6.56%	10.03%

资料来源: Craig Caffrey, "Saudi Arabia Increases Defence Budget," *Jane's 360*, December 21, 2017, <http://www.janes.com/article/76607/saudi-arabia-increases-defence-budget>, 登录时间:2018 年 1 月 8 日。

(三) 安全风险

在安全方面,近年来沙特本土恐怖主义、境外恐怖分子“回流”、胡塞武装越境袭击对该国国内安全构成的威胁呈现上升趋势。

第一,本土恐怖主义威胁。据《2017 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数据显示,在全球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国家的评级中,2017 年沙特恐怖主义指数为 5.808,受恐袭影响程度为中等偏上。^①在地区层面,沙特受恐怖主义威胁的指数居伊拉克(10)、叙利亚(8.621)、也门(7.877)、土耳其(7.519)、利比亚(7.256)、埃及(7.17)、苏丹(6.453)之后,在中东国家中列第 8 位,在海合会国家中位列第一;在全球层面,沙特在受调查的 136 个国家中位列第 26 位,较 2016 年上升了 6 位。受恐怖主义、地区冲突、教派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沙特国内遭受暴力恐袭的频率和受袭遇难人数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 2015 年以来,沙特国内因恐袭导致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见表 3)。

表 3 2009~2016 年沙特国内恐怖袭击事件死亡人数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死亡人数	5	/	3	3	1	18	107	106

资料来源: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7*, p. 39。因对恐怖袭击的定义不同,经济与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未统计胡塞武装越境袭击导致的死亡人数。

第二,境外恐怖分子“回流”风险。近年来,西亚地区恐怖组织的“去中心化”趋势凸显,恐怖组织借助分支力量壮大和扩张,突出表现为过去数年间“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埃及西奈半岛、沙特、也门、阿尔及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

^①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7*, November 2017, p. 10, <http://visionofhumanity.org/app/uploads/2017/11/Global-Terrorism-Index-2017.pdf>;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6*, November 2016, p. 10, <http://visionofhumanity.org/app/uploads/2017/02/Global-Terrorism-Index-2016.pdf>, 登录时间:2017 年 12 月 10 日。

北高加索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37 个以“省”(wilayat)^①为单位的分支机构。恐怖分子在不同恐怖组织和地区间的流动呈加剧态势,尤其在“伊斯兰国”实体遭剿灭后,盘踞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该组织恐怖分子正加速“回流”至母国或加入当地其他恐怖组织。据统计,2015 年至 2017 年 7 月间,全球 50 个国家的 2.8 万余名武装分子加入了“伊斯兰国”组织,突尼斯、沙特、俄罗斯、土耳其和约旦五国加入该组织的人员数量占其外籍武装人员总数的 60% 以上。^② 其中,有 3,244 名沙特籍武装人员加入了“伊斯兰国”组织,截至 2016 年 11 月已有 760 人返回了沙特。^③ 2017 年底“伊斯兰国”组织实体被剿灭后,该组织残余力量大规模集体“回流”的风险加剧,或将对沙特社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第三,胡塞武装越境袭击。自 2015 年 3 月沙特领导多国联军军事介入也门危机以来,也门胡塞武装通过频繁向沙特境内发射导弹和炮弹予以回击。2017 年 11 月 4 日,胡塞武装首次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方向发射弹道导弹,被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同月 7 日,胡塞武装扬言将向沙特和阿联酋的机场、港口及其他“重要区域”发起更多导弹袭击。沙特担忧,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实体力量被击溃后,经过叙利亚战场“洗礼”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可能回到国内,部分已经南下进入也门境内同胡塞武装联合作战。早在 2016 年 2 月,沙特军队发言人便敦促黎巴嫩阻止真主党向也门和叙利亚派遣“雇佣军”,但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对此多次予以否认。^④ 在此背景下,近年来频繁对沙特进行越境炮击的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部队和平民构成的安全威胁或将继续上升。

(四) 宗教风险

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宗教因素在与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不稳定因素互动的过程中,可能转化为宗教风险。当前,沙特面临的宗教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教派冲突。西亚伊斯兰国家间的教派冲突本质上是教派认同被高度政治化后成为地区大国进行决策和动员的工具,服务于它们争夺地区领导权所引发的政治冲突。自“阿拉伯之春”以来,沙特和伊朗利用教派政治在巴林、叙利亚、伊拉克、

^① Robin Wright et al., *The Jihadi Threat: ISIS, Al Qaeda and Beyond*,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Washington: Wilson Center, p. 16.

^②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7*, p. 64.

^③ Richard Barrett, *Beyond the Caliphate: Foreign Fighters and the Threat of Returnees*, October 2017, The Soufan Center, p. 13, <http://thesoufan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2017/11/Beyond-the-Caliphate-Foreign-Fighters-and-the-Threat-of-Returnees-TSC-Report-October-2017-v3.pdf>, 登录时间:2018 年 2 月 9 日。

^④ “Lebanon Must Act on Hezbollah in Yemen, Says Saudi,” *Al Arabiya*, February 24, 2016, <http://english.alarabiya.net/en/News/middle-east/2016/02/24/Yemeni-govt-says-have-evidence-Hezbollah-is-involved-in-backing-the-Houthis.html>; Ellen Francis and Laila Bassam, “Lebanon’s Hezbollah Denies Sending Weapons to Yemen,” *Reuters*, November 20,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syria-nasrallah/lebanons-hezbollah-denies-sending-weapons-to-yemen-idUSKBN1DK22D>, 登录时间:2017 年 12 月 19 日。

也门、黎巴嫩等国家开展代理人竞争。沙特国内的什叶派穆斯林数量约占人口的 10%~15%，东部省是沙特什叶派穆斯林主要的聚居区，该省盖提夫市历来是沙特国内教派冲突和什叶派族群抗争最严重的地区。2011 年“阿拉伯之春”、2016 年什叶派教士尼米尔被处决、2017 年什叶派教士穆罕默德·哈卜比被沙特当局逮捕等事件，都在盖提夫引发了大量什叶派民众以反对教派歧视为由进行的大规模抗议。与此同时，沙特当局对什叶派的高压政策也造成什叶派武装不时发动针对安全部队的暴力袭击，包括采用自杀式炸弹或简易爆炸装置等手段的恐怖袭击。

第二，宗教保守势力反弹。沙特近年来推出的“2030 愿景”、整顿宗教警察^①、兴建“尼尤姆”新城、赋予妇女驾车权利、推动伊斯兰教温和化、成立娱乐总署等现代化改革举措，遭到了国内极端保守的宗教势力的抵制。^②沙特的宗教警察一度拥有逮捕权、审讯权、起诉权等诸多权力。2016 年 4 月，沙特政府颁布政令，撤销宗教警察的执法权，限制其以宗教名义干涉社会事务的权利。2017 年 1 月，沙特大穆夫提阿卜杜·阿齐兹·阿勒谢赫 (Abdulaziz Al al-Sheikh) 公开批评政府成立娱乐总署的举措，声称电影院可能播放“无耻的、不道德的、无神论或腐朽的电影”，音乐会“没有什么好处”，只是为“男女接触”创造机会。^③阿瓦德·卡尔尼 (Awad al-Qarni)、萨勒曼·奥达 (Salman Oudah) 等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宗教学者，都试图通过社交媒体动员民众反对萨勒曼父子的改革计划。沙特政府采取了限制法特瓦 (宗教法令) 的颁布、大规模逮捕批评改革的宗教人士和学者、关闭异见人士社交媒体帐号等措施，来抵制社会中宗教保守势力反对改革的声音。随着大规模改革和整肃运动的推进，作为沙特政治结构三大支柱的王室、宗教精英和石油部门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萨勒曼父子的进一步集权为王室和保守宗教势力之间爆发冲突埋下了隐患。^④宗教保守势力的反弹正在挑战穆罕默德王储领导的大规模改革计划。有评论指出，“极端保守的宗教势力正日益感到自己远离‘新沙特’，他们变得恼火，终将转向彻底的叛乱。”^⑤

① 宗教警察是沙特等伊斯兰国家境内以抵制西方文化为目标的群体。沙特的宗教警察隶属于该国“劝善惩恶协会”，其主要职责是在沙特社会督促民众按照保守教义进行着装、在公共场合严格分离两性、督促穆斯林做礼拜等。

② James Dorsey, “Saudi Ultra-Conservatives Take Anti-Reform Stand on Women’s Sports,” *International Policy Digest*, April 30, 2017, <https://intpolicydigest.org/2017/04/30/saudi-ultra-conservatives-take-anti-reform-stand-women-s-sports/>, 登录时间:2017 年 12 月 20 日。

③ “Saudi Arabia’s Religious Authority Says Cinemas, Song Concerts Harmful,” *Reuters*, January 17,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saudi-entertainment/saudi-arabias-religious-authority-says-cinemas-song-concerts-harmful-idUSKBN1511LL>, 登录时间:2018 年 3 月 7 日。

④ David Ottaway, “Will Saudi Arabia’s Social Revolution Provoke a Wahhabi Backlash?,” *Viewpoints*, No. 126, May 2018, Wilson Center, p. 3.

⑤ *Ibid.*, p. 4.

第三,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泛滥是当前沙特面临的最突出的宗教风险之一,其不仅威胁该国国内社会安全,而且对沙特与外国关系造成压力。沙特历来保守的宗教环境为原教旨主义、宗教激进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宗教极端势力利用沙特国内的权力斗争、发展失调、治理赤字和宗教保守势力宣传的反西方思潮,逐渐发展出一套强调暴力抗争的政治话语,试图通过对穆斯林进行所谓的“正统性”改造来“净化伊斯兰教”。近年来,沙特国内受宗教极端思潮蛊惑加入极端组织或从事暴恐活动的人员呈现低龄化趋势,这使得沙特政府不断加强在教育系统和宗教机构推进去极端化工作的力度。2017年10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誓言摧毁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提出回归“温和伊斯兰”的主张;同月,沙特成立“萨勒曼国王圣训学会”^①,力图通过正本清源来消除各类与伊斯兰教教义相抵触和为犯罪、谋杀和恐怖主义行为提供正当理由的极端主义内容;11月,穆罕默德王储在“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IMCTC)首次防长会议上强调该联盟将加强军事、政治、金融和安全合作,共同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应对“后伊斯兰国”时代宗教极端主义煽动的暴力运动对沙特社会构成的安全威胁。

三、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挑战及应对

沙特近年来内政和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使该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面临的风险上升,上述风险对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成了现实挑战。

在政治领域,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如何确保中沙合作的政策延续性以及平衡中国与沙特和伊朗的关系。首先,沙特未来的政局走向取决于“穆罕默德王储能否比他的政治对手更快地建立起新的政治基础”,包括王室内部老一代亲王、利益集团在内的政治对手,仍有可能“重新集结和动用各种力量反对萨勒曼父子”。^②其次,西亚是“一带”与“一路”的交汇地带,同为地区大国的沙特和伊朗是中国重要的能源进口国和贸易伙伴。海合会国家担忧,伊朗一旦从“一带一路”中获得重大收益,沙特主导地区秩序的角色将受到削弱,在沙特看来,“一个

^① “Saudi Arabia to Vet Use of Prophet’s Sayings to Counter Extremism,” *Reuters*, October 18,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audi-islam/saudi-arabia-to-vet-use-of-prophets-sayings-to-counter-extremism-idUSKBN1CN1SZ>, 登录时间:2018年1月18日。

^② Shai Feldman and Tamara Cofman Wittes, “Saudi Arabia and Kuwait: A Trip Report,” *Brandeis University*, March 2018, p. 3, https://www.brandeis.edu/crown/publications/specialreport/Gulf%20Trip%20Report_final.pdf, 登录时间:2018年4月7日。

更繁荣的伊朗会威胁其周边的阿拉伯国家”^①。因此,完善与作为中沙高委会沙方牵头人的穆罕默德王储之间的政策沟通渠道,同时最大程度地避免卷入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地缘博弈和代理人竞争,是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在应对方面,首先,中国要推进落实中沙高委会会议和分委会会议达成的各项协议,确保政策延续性;其次,中国可考虑拓展对沙特王储私人办公室主任兼 MISK 基金会^②董事长巴德尔·阿赛卡尔(Bader al-Asaker)等穆罕默德王储身边人士的公共外交;最后,中国应加强对海湾地区危机、尤其是沙特与伊朗关系走向的研判。

在经济领域,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如何在应对沙国内经济转型阵痛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实现中沙发展战略对接。沙特经济转型的主要方向可以概括为:资源配置从依靠政府干预向依靠市场调节的方向转变;政府财政收入从依靠石油收入向扩大非石油收入的方向转变;产业结构从过度依赖石油经济向新能源和矿业等多样化领域拓展;企业所有制结构从国有化向加快私有化的方向转变;投资来源从基本依靠本国资本向重视吸引外资的方向转变;劳动就业从依靠外籍侨工向“沙特化”^③的方向转变。^④在应对方面,首先,中国要将能源合作领域拓展至原油存储、炼油、零售、油气设备制造、油服和研发^⑤等各个环节,夯实中沙能源合作的根基;其次,可考虑在中沙高委会下设立“中沙战略与经济对话论坛”,邀请双方政界、学界、商界人士共同探讨事关两国关系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和双方发展战略对接的具体领域;最后,在沙特沿海城市试点中沙职业教育项目,通过短期制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培养契合沙特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的技术工种,帮助提升沙特国内就业率^⑥。

① Giorgio Cafiero and Daniel Wagner, “What the Gulf States Think of ‘One Belt, One Road,’” *The Diplomat*, May 24,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5/what-the-gulf-states-think-of-one-belt-one-road/>, 登录时间:2017年9月20日。

② MISK 基金会成立 2011 年,是一个由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资助成立的旨在培养沙特青年领袖、鼓励青年创新和帮助青年就业的非盈利组织。

③ “沙特化”计划是由沙特劳工部实施的旨在增加私营部门沙特籍员工比例、提升沙特公民就业率的政策,该比例近年来逐年递增,导致大量外籍劳工离开了沙特。2017 年中国向沙特派出人数明显下降。2014~2017 年度中国向沙特派出人数分别为:19,337 人(2014 年)、25,417 人(2015 年)、29,423 人(2016 年)和 18,065 人(2017 年)。数据来源:文月:《2017 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发展述评》,载《国际工程与劳务》2018 年第 3 期,第 42 页;文月:《2016 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发展述评》,载《国际工程与劳务》2017 年第 3 期,第 42 页;文月:《2015 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发展述评》,载《国际工程与劳务》2016 年第 3 期,第 44 页;文月:《2014 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发展述评》,载《国际工程与劳务》2015 年第 3 期,第 45 页。

④ 参见陈沫:《“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中国与沙特经济合作的契机》,载《宁夏社会科学》2017 年第 5 期,第 98-100 页。

⑤ 全晓波、卢奇秀:《能源局副局长李凡荣:中阿能源合作的 3 点建议》,载《中国能源报》2016 年 10 月 26 日。

⑥ 据统计,沙特每年约有 60 万青年进入就业市场。参见 P.K. Abdul Ghafour, “600,000 Saudis Flood Job Market Yearly,” *Arab News*, March 27, 2014, <http://www.arabnews.com/news/546496>, 登录时间:2018 年 1 月 8 日。

在安全领域,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如何防范恐怖主义袭击和胡塞武装的越境袭击对在沙中国公民和企业造成的威胁。在恐袭方式上,简易爆炸装置、枪击和越境炮弹和导弹袭击是近年来沙特国内恐袭的主要类型。在地区分布上,沙特东部省盖提夫是简易爆炸装置、枪击的高发地区;沙特西南边境三省(吉赞省、纳季兰省和阿西尔省)和首都利雅得境内目标是胡塞武装越境袭击的主要对象,这些地区均有中国企业驻扎。自2015年以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多次发布安全提示,提醒上述地区的中国公民和企业注意胡塞武装袭击引发的安全风险。在应对方面,首先,中国要加强对沙特境内恐袭高发地区地形、气候和环境的研究,可探索智库学者入驻中国驻沙使馆和当地企业进行实地调研的“旋转门”新机制,依托沙特智库和调研机构等联合开展研究项目,逐步建立起“政府—企业—智库”三位一体安全评级体系,分级、分批确立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省市和重大项目;其次,中国要加快中东小语种反恐人员、专业反恐情报搜集员、反恐情报搜集分析员等与反恐情报体系建设配套的人才建设;再次,中国要加强对中东地区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涉华言论的系统分析和研究,掌握地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发展动向;最后,在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等框架机制下,开展中国与沙特围绕去极端化工作的经验交流。

四、结 语

中沙关系对中国发展同海合会国家、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间的合作关系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沙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宗教领域面临的风险,既有其历史和制度根源,同时也是沙特近年来国内大规模改革阵痛的表现。当前,中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沙特也启动了全方位改革计划,推动“一带一路”与“2030愿景”对接,不仅惠及两国人民,也是深化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打造两国全方位立体合作新格局的重要内容。沙特国内各领域风险的特征表现及发展趋势,决定了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需要进一步重视确保中沙合作的政策延续性,平衡中国与沙特和伊朗的关系,适应沙特国内经济转型带来阵痛,寻找更多中沙发展战略对接的利益契合点,以最大程度地实现中沙发展战略对接,同时防范恐怖主义和胡塞武装越境袭击对在沙中国公民和企业造成的威胁。

(责任编辑:赵 军)